

吴天任 著

梁啓超年譜

第四冊

南方出版傳媒
廣東人民出版社

吴天任 著

梁啟超年譜

第四冊

南方出版傳媒
廣東人民出版社

· 廣州 ·

中華民國九年庚申（一九二〇），先生四十八歲。

先生此次歐遊，曾訪晤平日傾仰已久之唯心主義哲學家多人，如法國柏格森，及其師蒲陀羅，德國倭伊鑑等。其訪柏蒲二氏在何月日，均無紀錄，可能同在民國八年，因先生於訪柏氏後，是年六月九日，致仲策書，謂柏氏稱先生等研究彼之哲學極深邃云。訪蒲陀羅時，蒲氏對先生謂：「一個國民，最要緊的，是把本國文化，發揮光大。……你們中國，着實可愛可敬，我們祖宗裏塊鹿皮，拿把石刀在野林裏打獵的時候，你們不知已出了幾多哲人了。我近來讀些譯本的中國哲學書，總覺得他精深博大，可惜老了，不能學中國文，我望中國人總不要失掉這分家當才好。」（先生歐遊心影錄中國人之自覺十三）先生聞之，頓覺有數百斤重擔加於肩上，以一味向外追求為捨本逐末，故回國後萃力整理固有學術文化，蓋緣於此。至訪倭伊鑑則在今年一月一日，張君勸於其晤談情形，曾詳述之。

張君勸學術方法上之管見，述先生訪晤倭伊鑑事：「任公先生忽自想起曰：日本人所著歐洲思想中，必推柏格森、倭伊鑑兩人為泰山北斗，我既見法之柏格森，不可不一見德之倭伊鑑。奔走旅行道上，無法覓人介紹，乃自致一電於倭氏，述願見之意，且懇其寄覆信於耶納之某客舍中。及抵耶納，則倭氏覆書已在，極道歡迎之意。是日為一千九百

十九年正月一日（張朋園按：應爲一九二〇年正月一日）訪倭氏於宅中，談約一時半之久。所談不外精神生活與新唯心主義之要點。任公先生再三問精神物質二者調和方法，……倭氏哲學之大本曰精神生活，而精神與物質相對待，捨物質則精神無所附麗，捨精神則濁之物質無由向上。此二者之相須爲用，厥在行爲，厥在奮鬥。故黑智兒輩之以爲真理可以在論理上求之者，正相反對。倭氏爲人，獨立演臺自述所信，雖千人爲之辟易，而兩人對答，則訥訥如不能出諸口。倭氏對於任公先生之問，自知難以一二哲學觀念表示，乃屢屢以兩手捧其赤心，以表示將精神拿出來參透物質之意。彼之以兩手捧赤心之動作，一再不已，我之旁立而聽者，尤感其誠意，相喻於不言之中。是日倭氏以自己著作一一署名分贈之諸來客。又以任公先生新唯心主義與舊唯心主義之異同一問，非立談之間所能畢事，自允手寫一文，……待吾等遊耶納及路德幽囚之地華德堡而返柏林，則倭氏之文，已先我等而來。以倭氏七十老翁，精神矍鑠，一如少年，待異國人親切真摯。」（張撰梁啓超與民國政治七章一節二注五，引改造雜誌四卷五期）

先生在德國，一月三日遊馬丁路德避難譯經處，同日遊槐馬，五日遊希拉爾與葛特故居，七日返柏林。

先生一月七日致令嫻明信片，述遊德情形：「費十日之力，遊德國外省，略觀其概，今日

返柏林，三日後將去德國矣。此次遊德，費日少而所得多，最滿意。日來早睡早起，神志健旺。」（據長編初稿錄）

先生與同人等，在歐洲商定歸國後之事業進行計畫，大致爲（一）致力社會文化教育，包括辦大學，及資派留學。（二）出版書籍雜誌。（三）從事講學。以上三項，皆屬培養人才，開拓同道之舉。（四）興辦實業，藉作上述計畫之經濟支柱。其詳可從張君勛致黃溯初書中見之。

張君勛一月十二日致黃溯初書，述與先生等在歐商定歸國後各事之計畫：「溯初吾兄：任公遊一年，行將歸矣。登岸後方針之宣布，前函已詳，茲不贅。惟在歐所商不止一事，敢爲公言之，並望將其先後次第，詳加討論焉。一、中比貿易公司。二、中比輪船公司，此二事雖二而實一。三、月報及印刷所。四、大學。五、派留德學生。第一第二兩事，詳致公權函電中，諒公已知之。第三事，月報月出兩期三期。尚未大定，總之在必辦之列。並擬爲文化運動計，創刊小叢書，故非自辦印刷所不可。大旨擬集資五萬，並以商業方法經營之，恐亦不難支持焉。第四事即前馮河間所提，河間去矣，此後辦法非敢懸斷。第五事以此次赴德，覺學費之廉，出人意外，現一元可易五十馬克，每學生得三十元或四十元（即一千五百馬或二千馬），儘可從容度日，如國內大公司如中原公司之類，每年能出資萬元或五千元，可派學生十人或二十人。國內後起不乏才智，李石曾

留法勤工儉學會以招至萬人爲度，吾儕並此不圖，尙何新人才之可言，此事並非與李競爭，爲國家計，應如此也。

以上五事，每事所需人才甚多，故其舉行之先後，人才之分配，不可不斟酌。第一第二兩事，總須有第一等人才方能與外人共事，以弟所見，由公及舍弟揆初、振飛、仍珠、光甫、季馨等分數人專任之。至應募股本，則範圍自應較廣。第三事除任公擬定編輯人外，其經理印刷所之人，亦不可不注意。總之，應作爲一種獨立商業，不可與政黨財政混同，方能持久。第四事以弟所見現時無從辦起，以現有人才分配於以上三事，已屬不敷，尙何大學可言。弟意與其自辦大學，不如運動各省籌辦而自居於教授，只求灌輸精神，何必負辦學責任乎。任公於編纂雜誌之外，在北方學校中居一教習地位，亦計之得者也。第五事如馮河間家能提興學之費五萬元，則每學生期以五年、四年，可得畢業生二十人，但德國大學純採自由制，大學功課自己選擇，非招致科學有根底者難收效果，弟意擬分三等，日本或美國大學畢業者爲第一等，科學有根底而英、德、法文不深者爲第二等，但通德文同濟學堂之類是爲第三等。學生招齊後，由森在歐隨時考察，並告以求學之門徑，或者收效不在內地辦學下也。弟意擬在德辦一預備班，除德語外授以應學之根本智識，（但大學正式畢業者不在此限）一年後方得自由求學，石君醉六與任公、

百里交甚深，與弟亦熟識有年，向爲松坡參謀，三次革命後留日攻德語與哲學，此人應爲之籌一二千元之費，令其即來德，待彼於德學風熟習後，則留德學生之指導，可由彼任之，不必弟在歐矣。

以上各事，深恐任公歸後手忙腳亂，絕不計其輕重緩急，而又信口胡說，故爲公一一詳之，並望與東蓀先生、宗孟、子楷、崧生、爲藩詳計之。再宗孟之來，想已定計，以弟觀之，宗孟應作留學之計，不可作遊歷計，此點已爲任公言之。以遊歷必受人招待，匆匆觀其大略，決不能窺其深處，且以宗孟之英文本有根底，留英一年，則口耳之學已自由自在，再以一、二月爲遊歷計，則所得較多矣，此層望爲宗孟言之。後起人才，固應設法培養，而如公如宗孟得多來歐，均屬不可緩之舉，以出遊者不徒明瞭大勢，且能增進勇氣，覺中國事非不可爲，故弟望公之來，不亞於宗孟也。弟上半年在法，暑假在德三月，年終取道美國歸國，所念念不忘者，在延攬同志而已。惟內地吾黨旗幟不鮮明，則招致新人才之舉，無由着手，故任公宣布方針，及此後雜誌之論調，總以打破軍閥，改進社會爲目標，要之，應與世界潮流相應，不可專顧國內環境而已。匆匆不盡欲言。」

（據長編初稿錄）

先生以一月十七日自巴黎起程歸國，十八日抵馬賽，以待船期，乃於二十日遊馬賽附近之

尼士，二十一日遊賭國孟的加羅，二十三日始由馬賽首途返國，三月五日抵上海。

是時日本駐京公使向我提出山東問題，要求由中日兩國直接交涉，廣東湖北等省，及上海全國學生聯會，皆通電反對。先生抵滬，亦曾發表談話，以既拒簽字於前，絕不能直接交涉於後，否則前功盡失，自喪信用。至對國內現實政治與各方面之黑暗，則深感不滿。

申報三月七日記先生抵滬之談話：「梁任公日昨抵滬時，某君在碼頭相迓，匆匆一談，某君先詢對於外交方面之意見，梁曰：『余初履國土，即聞直接交涉之呼聲，不勝駭異。夫既拒簽字前，當然不能直接交涉於後，吾輩在巴黎時對於不簽字一層，亦略盡力，且對於有條件簽字說，亦復反對，乃有不簽字之結果。今果直接交涉，不但前功盡失，並且前後矛盾，自喪信用，國際人格從此一蹶千丈，不能再與他國爲正義之要求矣。其間最足感人聽聞者，爲英、法感情說，以爲提出聯盟，必大傷英、法感情，此說實不值一笑。殊不知和會與聯盟會完全不同，和會代表各國，聯盟則爲國際之一共同機關，和會猶如省議會聯合會，而聯盟則參議院也，雖同由省議會選出，其性質不同。聯盟既爲超然之一機關，當然不能以一、二國之感情爲本位，且訴諸聯盟與退出和會不同，當然不傷英、法感情，雖訴諸聯盟得勝與否，仍在未可知之數，然吾輩固以此問題引全世界人之注意，將來必有好影響。天下惡事必與秘密相伴，愈公開則正義愈明，一國之政治

能公開于全國人，一國之外交能公開于全世界，則流弊自然減少，而至于無也。』云云。某君又叩以歸後對於社會從何方面盡力，梁曰：『去國一年餘，對於國內情形頗不明瞭，惟對於此種狀態亦不願加以考究決定。對於現實的方面，（尤以政治方面爲最）皆一概絕緣，而對於各方面的黑暗，則由個人良心爲猛烈的攻擊，暫時如此。以後研究有得，再擬定建設方針，供國人之採擇』。（據長編初稿錄）

先生抵滬後，曾應吳淞中國公學之邀，演講歐遊觀感，以此行對中國前途，一改前此悲觀之念，精神振作，回復樂觀。從政治、社會、經濟三方面，論中國不宜效法歐洲，當將固有國民性發揚光大，變消極爲積極，則前途未可限量矣。

申報三月十四、五日，記先生在中國公學演說：「此次遊歐，爲時短而歷地多，故觀察亦不甚清切，所帶來之土產固不甚多，唯有一件可使精神大受影響者，即悲觀之觀念完全掃清是已。因此精神得以振作，換言之即將暮氣一掃而空，此次遊歐所得止此。何以能致此，則因觀察歐洲百年來所以進步之故，而中國又何以效法彼邦而不能相似之故，鄙人對於此且有所感想。考歐洲所以致此者，乃因其社會上政治上固有基礎，而自然發展以成者也。其固有基礎與中國不同，故中國不能效法，歐洲在此百年中，可謂在一種不自然之狀態中，亦可謂在病的狀態中，中國效法此種病態，故不能成功。」

第一以政治論，例如代議制乃一大潮流，亦十九世紀唯一之寶物，各國皆趨此途，稍有成功，而中國獨否，此何故？蓋代議制在歐洲確爲一種階級，而在中國則無可能性，蓋必有貴族地主，方能立憲，以政權集中于少數賢人之手，以爲交付于群眾之過渡。如英國確有此種少數優秀之人，先由貴族擴至中產階級，再擴至平民，以必有階級始能次第下移，此少數人皆有自任心。日本亦然，以固有階級之少數優秀代表全體人民。至于中國則不然，自秦以來，久無階級，故欲效法英、日，竟致失敗，蓋因社會根底完全不同故也。中國本有民意政治之雛形，全國人久已有輿論民譽之印象，但其表示之方法，甚爲渾漠爲可憾耳。如御史制度，即其一例。其實自民主主義而言，中國人民向來有不願政府干涉之心，亦殊合民主主義之精神，對於此種特性，不可漠視。往者吾人徒作中央集權之迷夢，而忘却此種固有特性，須知集權與中國民性最不相容，強行之其結果不生反動，必生變態，此所以吾人雖欲效法歐洲，而不能成功者也。但此種不成功，果爲中國之不幸乎？先以他國爲喻，如日、德究竟其效法于英者爲成功歟，抑失敗歟？日本則因結果未揭曉，懸而勿論。且言德國，其先本分兩派，一爲共和統一派，一爲君主統一派，迨俾士麥出，君主統一乃成。假定無俾氏，又假定出于共和統一之途，吾敢斷言亦必成功，特不過稍遲耳。又假定其早已採用民主主義，吾敢決其雖未能發展如現在之速

，然必仍發達如故，則可見此五十年乃繞道而走，至今須歸原路，則並非幸也可知矣。總之，德國雖學英而成，然其價值至今日則仍不免于重新估定，如中國雖爲學而失敗者，則其失敗未必爲不幸。譬如一人上山，一人走平路，山後無路，勢必重下，而不能上山者則有平路可走，可知中國國民此次失敗，不過小受波折，固無傷于大體，且將來大有希望也。

第二論社會亦然，中國社會制度頗有互助精神，競爭之說素爲中國所不解，而互助則西方人不甚了解，中國禮教及祖先崇拜，皆有一部分出于克己精神與犧牲精神者，中國人之特性不能拋棄個人享樂，而歐人則反之。夫以道德上而言，決不能謂個人享樂主義爲高，則中國之所長，正在能維持社會的生存與增長，故中國數千年來經外族之蹂躪，而人數未嘗減少，職此之故。因此吾以爲不必學他人競爭主義，不如就固有之特性而修正與擴充之也。

第三論經濟，西方經濟之發展，全由于資本主義，乃係一種不自然之狀態，並非合理之組織，現在雖十分發達，然已將趨末路，且其積重難返，不能挽救，勢必破裂。中國對于資本集中，最不適宜，數十年欲爲之效法，而始終失敗。然此失敗未必爲不幸，蓋中國因無貴族地主，始終實行小農制度。法國自革命後始得之，俄多數派亦主張此制，而

中國則固有之現代經濟，皆以農業經濟爲基礎，則中國學資本主義而未成，豈非天幸。將來大可取新近研究所得之制度而採用之，鄙人覺中國之可愛，正在此。

總之吾人當將固有國民性發揮光大之，即以消極變爲積極是也。如政治本爲民本主義，惜其止在反對方面，不在組織方面，社會制度本爲互助主義，亦惜止限于家庭方面，若變爲積極，斯佳矣。鄙人自作此遊，對於中國甚爲樂觀，興會亦濃，且覺有消極變積極之動機，現已發端。諸君當知中國前途絕對無悲觀，中國固有之基礎亦最合世界新潮，但求各人高尚其人格，邁進前往可也。以人格論，在現代以李甯爲最，其刻苦之精神，其忠于主義之精神，最足以感化人，完全以人格感化全俄，故其主義能見實行。惟俄國國民極端與中國人之中庸性格不同，吾以爲中國人亦非設法調和不可，即于思想當爲澈底解放，而行爲則當踏實，必自立在穩當之地位。學生諸君當人人有自任心，極力從培植能力方面着想，總須將自己發展到圓滿方可對於中國不必悲觀，對於自己則設法養成高尚人格，則前途誠未可量也。」（據長編初稿錄）

先生留滬十餘日，三月十九日，入京謁總統徐菊人，報告歐遊經過。並發表對山東問題之意見，主張拒絕直接交涉，以日本雖勝實敗，我則雖敗實勝，以英法美各國對我皆同情也。此外又致書徐總統，請釋放去年因五四運動而被捕之學生。（據丁文江注：致徐書見三

月二十六日申報)

申報二十三日載先生對山東問題之談話：「任公到京後，曾告其友某君云：『山東問題余初到北京尚未悉當局之真意若何，惟聞日本送來之通牒，至今仍在擱置之中，余亦未悉其內容何似。余意山東問題在和會失敗之原因，固甚複雜，而英、法之敷衍日本，實爲其主因之一。然自吾國拒絕簽約後，英、法輿論亦多數對於中國深表同情，不特美上院大倡反對之論已也。是以由公理方面言之，此事日本雖勝利而實失敗，吾國雖失敗而實勝利。蓋人類天性，每對於弱者表同情，強權的外交此後必漸失其效力，今吾國若盡廢拒絕簽約之前功，竟允日本之要求，而有直接交涉之事，而國家人格因此失墮，前此對我表示同情者，必皆失望而去，是日本于勝利之外，更加一層勝利，而吾國之失敗遂終於失敗矣。至于拒絕直接交涉之後，將此事提出于國際聯盟，勝負之數究竟如何，今日無論如何皆不能斷定，且其手續應行研究之處甚多，亦非短時間所能談及。總之，爲國家人格計，余以爲今日不可不先有拒絕直接交涉之決心耳。』」（據長編初稿錄）

三月二十四日，先生自京返津，致書令嫻，告歸國以來親友宴談，家庭融洩之樂，與今後進行各事。

先生三月二十五日（舊曆二月六日），致令嫻書：「吾以十二日（舊曆正月）抵香港，

敬謁祖父殯宮。在港與諸親故盤桓永日，旋即登舟，十五日抵滬，諸親友來迎者頗衆，館於張菊生家，叔通、東蓀、溯初屢作深談，旋應張季直之招，往南通淹留三日，復返滬。滬上政客未接一人，最爲快事。二十四日發滬，（在南京未下車）二十五日抵家，都中親故來津相迎，旅舍爲滿，家中群童迎於新站，汝母迎於老站，是夕諸友在家爲我洗塵，翌日爲我介壽，將未成之新居權布筵席，主客熙熙，有如春釀。在家小憩後，以二十九日入都，向當道循例一周旋。初三日便返津，除最稔諸友共作飲食宴樂外，一切酬應皆謝絕，東海約宴亦謝之。然旬日以來，亦頗勞頓矣。每晚客散後，與汝母雜談，動至夜分。返津兩日來客稍稀，夕間輒與汝母對酌，微踵其樂也。（久不御黃酒，歸來開陳釀至樂，但飲後覺不甚受用，數日後亦擬節之矣。）思成輩皆漸知向學，幼者亦益可愛，家庭中春氣盎然，惟汝不在旁，美猶有憾耳。吾自歐遊後，神氣益發皇，決意在言論界有所積極主張，居北方不甚便，兩月後決南下，在上海附近住，想汝亦必以爲然也。汝在仰光病已數次，兩孫亦常不適，當是水土所致。汝曹生長在較北之地，久居炎方，恐非所宜，早日寧家爲妙。今年吾與汝母合成百歲，吾生日汝既未歸，深望汝母生日時作一大團聚。汝來稟屢言明春必歸，能早數月更慰老懷也。前書言中比公司事，頃股本咄嗟已滿，不必復求林振宗矣。惟吾欲在上海辦一大學，彼若有志能相助最善，（

彼新居落成，禮物日內當即寫送）吾擬別作一英文書與言，汝謂何如。」（據長編初稿錄）

先生返國後一年中，除從事著述外，並根據在巴黎與同人商定之事業計畫，着手施行，先後成立共學社、講學社，及整頓改造雜誌，以上為致力社會教育文化之事業。又籌辦中比實業公司，作經濟基礎。接辦中國公學，以培育人才。以下依次引錄有關資料分別述之。

四月，共學社成立，社址設在北京石達子廟，以「培養新人才，宣傳新文化，開拓新政治」為宗旨。主要工作為編譯新書，獎勵名著，出版雜誌，選送留學生。首腦人物除先生外，有蔣百里、張君勱、張東蓀等。蔡子民（元培）、王搏沙（敬芳）、藍志先（公武）、張季直（謇）、張菊生（元濟）、蹇季常（念益）、丁在君（文江）、梁伯強（善濟）、籍亮儕（忠寅）、蔣夢麟、趙元任等，均為發起人之列。社中經費，由有關同人捐助，先生曾將其歐遊心影錄一書所得，捐助四千元。（據張撰梁啓超與民國政治六章二節一）

張菊生四月十日致先生書，允撥款支持共學社輯譯新書，合作出版：「別來瞬將踰月，至為馳念。夢旦南歸，述及起居安吉，興致如恆，聞之欣慰。前尊意擬集同志數人，譯輯新書，鑄造全國青年之思想，此實為今日至要之舉，敝處擬歲撥兩萬元先行試辦，仰蒙采納。夢旦又言在津與公晤談，尊意欲更為久大之計畫，屬加撥兩萬元為兩年之布置

，鄙意當屬可行。此事得公提倡，必有裨益，惟前允將一切計畫開示，尚未奉到，想因有擴充辦法，故一時未能決定，可否即請將兩年之計畫預爲籌示，以便與同人商定，至爲禱盼。公司股東年會已定於五月八日，彼時台從當可蒞滬，甚盼惠臨見教，萬一文旆不克南來，務祈推派代表。再本屆贏利，現已結算，可比上屆爲優，並以奉告。」

蔣百里四月十七日致先生書，商共學社規約人事等項：「任師座下：前奉二書，想均到。茲有應陳諸事數則：一、共學社開會情形及議決規約，今已印就，即寄奉一份。吳品今來談領用書記庶務一人，渠推薦同學一人，已囑其日內一來，擬即聘定。（此人雖未譯書，將來亦有□資格，聞英、日文均佳云。）一、醉六來書即附呈，擬日內即覆書，詳細將原委說明，如先生能作一書，寄震一併寄往，則更佳矣。一、昨接振飛電，深知菊生於商務印書館總理決意辭退，現在已準備交代云。菊生果能別樹一幟，豈不大妙。一、南洋中學送來章程一本，藏書目一冊，另行寄上，此爲東南最大私立學校，求先生爲一弁言，並求親筆原稿，以便石印。一、聞黃陂昨日宴客有入中比股意，不知是事實否。一、震以身體未盡復原，故擬星期一往湯山小住二、三日。先生西山之遊，能於十日內舉行最妙，以此時共學社及圖書俱樂部等均陸續進行有眉目也。」

先生與蔣百里書，商爲共學社募集基金各事：「學社規約稍有修改，請集董事、幹事再

開會一次，決定後印數百張，備向各處募集基金，別擬募捐啓一紙，並希提出採用。啓中似以發起七人出名便得，因各董事尚有未得本人承諾者，待得回信方能列名，未免費時也。募捐啓如可用，亦請印一、二百張，（紙須稍佳，印成後請寄數十張來）分途往募，各人有特別交誼者，除公啓外，賸以私函，當更有力。如商務印書館、南洋烟草、大生紗廠等處，僕當加函。如穆藕初、聶雲臺諸處，請蔡先生或夢麟加函。如福公司請搏沙加函。多爲其途，當可有獲，希與同人熟商進行。又趙君元任清華交涉如何？亦望蔡先生速爲布置，至盼。」

又與張東蓀書，言共學社章程及編譯書目各事：「共學社章寄上，請以一份交菊生。此間社員已有二十人，原單外加入數人，滬上更待幾人耶。編譯書目已列單請社員自認，彙齊當奉塵。頃讀公致志先書，何忽悲觀至是，然爲道日損之說，却是切實受用，願共勉之。」（並據長編初稿錄）

先生歸國經月，雖生活安適，而客訪不絕，著述又忙，暫無遠遊意，頗望長女令嫻，今年能回國度歲也。

先生四月二十日致令嫻書：「吾方與汝母言，以久不得汝書，頗懸懸。汝母謂我歸來僅逾月，汝已有一書，不可謂稀，語未終而汝第二書至，吾喜可知也。吾歸後極安適，惟